

# 中国与美国在押犯人思维风格比较

朱海燕, 宋志一, 宋星

(云南师范大学心理系, 云南 昆明 650092)

【摘要】 目的:探讨中国罪犯与美国罪犯思维风格的差异。方法:采用 PICTS 为测量工具对 79 名男性罪犯的思维风格进行测试。结果:两组罪犯在安慰型和自我消除型分量表上无显著差异,在权利型、超乐观型思维倾向上,国内罪犯显著低于美国罪犯,而在能力取向型、感伤型、认知懒散型和中断型四纬度上均显著高于美国罪犯。结论: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国内外罪犯在犯罪思维风格的各维度上有不同的表现。

【关键词】 思维风格; PICTS; 罪犯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08)06-0579-03

##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riminal's Thinking Styles

ZHU Hai-yan, SONG Zhi-yi, SONG Xing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Chinese and American Criminal's thinking styles. **Methods:** 79 male criminal were tested with CPI. **Results:** The comparison presented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wo criminal groups in the Mollification scale and the Cutoff scale. Chinese criminals were lower than American Criminals in the Power Orientation and the Super-optimism scale. However, they had higher scores than American Criminals in the Entitlement scale, Sentimentality scale, Cognitive Indolence scale and the Discontinuity scale. **Conclusion:**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 influence, there is much difference on the thinking styles of criminals between two countries.

【Key words】 Thinking styles; PICTS; Criminal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社会行为是个体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与对他人的反应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sup>[1]</sup>。因此研究者普遍假定,越轨行为的产生通常是由于罪犯群体有不良的认知方式<sup>[2-4]</sup>。Sykes 和 Matza 等研究者于 20 世纪六十年代就曾指出<sup>[5]</sup>,罪犯并非缺乏传统的价值观,但他们更倾向于采用中和技术(包括否认责任,否认损害,否认被害人,责备谴责者和高度效忠群体五个方面),为越轨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从而得以形成和维持越轨行为。后期,研究者 Walters 和 White<sup>[2]</sup>更为系统的指出条件、选择和认知是导致犯罪活动发生的原因。其中认知是个体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其行为和决定的正当化和合理化的观点或认知系统,它不只是增强了对选择的支持,同时对决策的过程和个体知觉也进行修正,因此是罪犯行为形成和持续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罪犯心理研究者在重点考察犯罪环境与犯罪倾向互动作用的同时,越来越关注个体在犯罪机遇面前的理性决策问题<sup>[6]</sup>。然而,研究仅仅集中于罪犯人格的冲动性行为特征这一单一维度的比较<sup>[7]</sup>,并未尝试从多维度对罪犯的思维风格进行评定。直到近期,Walters 等研究者<sup>[8-10]</sup>以罪犯思维过程为出发点,编制并修订了 PICTS 量表,才使得较为全面的理解罪犯的思维风格成为可能。该量表包

含了相互交错的 8 种思维方式,均具有较高的信效度。目前该量表广泛应用于美国各级监狱。本研究引入 Walters 汉化版本的 PICTS 量表,以期对国内罪犯的思维风格进行初步探索,并将其与美国罪犯的思维风格进行比较,以获得两种不同文化背景条件下思维风格的差异。

## 1 对象与方法

### 1.1 被试

参照 Walter<sup>[8]</sup>等研究者关于罪犯思维风格研究中被试选取的基本构成条件,本研究从年龄、犯罪类型、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四方面选取与其匹配的男性罪犯 88 名,被试全部来自云南省某中型监狱,涉及盗窃、故意伤害、涉毒和经济类四类犯罪类型,刑期均为 20 年以下;删除 9 份回答不真实(识别无效答卷的标准  $T_{CF-r} > 80$ ,  $T_{DF-r} > 65$ )的答卷,实际进入统计分析的有效样本容量为 79 人,所有被试年龄在 18-50 岁之间( $M=27.32$ ,  $SD=6.40$ ),其中小学文化 6 人,初中文化 44 人,高中文化以上 29 人;初犯 66 人,累犯 13 人。

### 1.2 测量工具

采用 Walter 和 White 编制并修订的 Psychological Inventory of Criminal Thinking Styles (PICTS) 量表,结合研究者同时提供的中文版本(香港版),对其个别词汇进行修改,使之符合中国大陆的语言习

惯。该量表包括 80 个题目,8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均达到 0.5 以上,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预测效度<sup>[10]</sup>。

### 1.3 施测程序及数据处理

原始数据的收集采用团体测验方式在各监区的教室里完成,并严格按照 PICTS 手册中所规定的手续和程序实施测验。为了尽可能降低被试的防卫心理,保证测验结果的有效性,不要求被试在答卷上填写自己的姓名,并说明回答结果与他们的改造没有任何关联,同时根据手册的规定对无效答卷进行了识别和删除;对于少数实际文化程度达不到初中可能影响理解测验项目含义的被试,单独组织测验,采用主试念题目,被试听懂后自己选择答案的方式,对每个项目采用中等语速念两遍。由于构成本研究样本的被试是特殊人群,故以同质性信度  $\alpha$  系数为指标计算了各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发现 8 个思维风格分量表的  $\alpha$  系数在 0.43-0.70 之间,平均值为 0.57,接近 PICTS 常模团体提供的同质性信度的资料。

采用 SPSS10.0 进行数据分析。

## 2 结 果

以 Walter 等人编制罪犯思维风格问卷(PICTS)中所选用的美国中型监狱的罪犯(Walters)<sup>[8]</sup>为对照组,在两个有效性分量和 8 个思维风格分量表上考察两种文化条件下罪犯的思维风格特性,结果显示,两组被试除了在安慰型和自我消除型分量表上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外,在两个有效性分量和和其他 6 种思维风格分量表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有效量表中的混乱性维度,云南省罪犯显著低于美国罪犯,而在有效量表中的防卫性维度上,则非常显著的高于美国罪犯;权利型、超乐观型思维倾向上,国内罪犯显著低于美国罪犯,而在能力取向型、感伤型、认知懒散型和中断型四维度上均显著高于美国罪犯。见附表。

附表 中国与美国罪犯在 PICTS 各分量表上的平均数、标准差和  $t$  值

分量表	中国(n=79)	美国(n=150)	$t$
有效性1-混乱性(Cf-r)	13.30 ± 3.47	14.37 ± 3.24	-2.31*
有效性2-防卫性(Df-r)	21.10 ± 2.78	15.75 ± 3.09	12.83****
安慰型(Mo)	12.96 ± 3.50	12.15 ± 3.73	1.59
自我消除型(Co)	11.66 ± 3.08	12.15 ± 5.31	-0.75
权利型(En)	10.68 ± 2.26	11.92 ± 3.70	-2.71***
能力取向型(Po)	13.81 ± 3.31	11.39 ± 3.48	5.06****
感伤型(Sn)	18.42 ± 4.11	17.05 ± 4.07	2.40**
超乐观型(So)	12.10 ± 2.73	13.77 ± 3.97	-3.33****
认知懒散型(Ci)	15.84 ± 3.65	14.35 ± 4.96	2.34*
中断型(Ds)	15.78 ± 4.17	13.45 ± 4.78	3.64****

注: \* $P<0.05$ , \*\* $P<0.02$ , \*\*\* $P<0.01$ , \*\*\*\* $P<0.001$ 。

## 3 讨 论

PICTS 量表测查了犯罪过程中罪犯对其行为的

解释和认知的不同特性,是帮助研究者深入理解犯罪活动原因的一个较好的工具。经比较,本研究中国内罪犯与美国罪犯在大多数思维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首先,在罪犯答题风格上,与美国罪犯相比,国内罪犯在内容-混乱性回答倾向上有显著较低的表现,而在内容-防卫性回答倾向上有显著高的回答倾向。Walters 指出,较低的 Cf-r 表明罪犯存在不随意性或情绪混乱性,较高的 Df-r 表明罪犯存在较高的防卫性,但在适度防卫内,并不影响 PICTS 问卷的作答模式和结果的解释。这表明,国内罪犯在答题中存在更多的情绪混乱现象,并更多的表现出强烈的防卫或防备心理。这一结果与新近有关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研究结果一致。国内王登峰等研究者指出,中国文化中“人性本善”一直占据上风,而西方文化中则一直是“人性本恶”占据上风。因此,如果西方人在言行中表露出“恶”的一面,且由于人性本恶,他们的防御也相对比较少<sup>[11]</sup>。

其次,两组罪犯在安慰型和自我消除型思维风格上不存在显著差异。Walters 指出这两种思维风格反映了,罪犯一方面倾向于不断抱怨或埋怨外部因素(如,家庭教养、贫穷、政府),将过去和现在犯罪行为的计划过失归咎于外部因素的影响,从而逃避对自己的行为和决定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虽然在一般场合下罪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在极端的压力场合下都是冲动的,缺乏忍耐和对自己情绪控制的技能,并倾向于使用类似“他妈的”等习惯用语以消除由于犯罪而产生的威慑的心理感受。本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外罪犯都倾向于将自己的犯罪归结于外部因素以逃避责任。这一结果在国内外大多数研究中均获证实,犯罪人对其犯罪行为的解释不仅外部归因占有优势,而且总能寻找理由为自己进行辩解或辩护<sup>[12,13]</sup>。

第三,在权利型和超乐观型两种思维风格维度上,国内罪犯均显著的低于美国罪犯。PICTS 量表中权利型反应的是个体的独特的所有权意识,较高权利型思维模式的罪犯总倾向于认为他或她自己有权利违反社会法律以及有侵犯他人权利的权利。超乐观型说明的是罪犯对消极后果(禁闭、伤害、死亡)确认的推迟性意识或避免产生消极后果的犯罪思维的倾向性程度,通常超乐观罪犯有着脱离实际的过分自信心,并总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计划。本研究结果表明,①国内罪犯做出犯罪选择较美国罪犯更少具有绝对自由意识,而表现出更认可现实生活中法律

所规定的权利范围。我国学者在有关犯罪行为的化解阻断模式的论证中提出,多数罪犯对获取财富的合法方法的拥有,倾向于肯定的态度,即:对于大众生活较为重要的一些资源的获取,大多数罪犯更倾向遵守或认可社会规则<sup>[14,15]</sup>;②相对美国罪犯,我国罪犯更倾向于接受已产生的消极后果,对当前的消极后果及未来的生活有相对悲观的认知和情绪,从而表现出被动的接受且无计划性的行为特征。

第四,在能力取向型(Po)、感伤型(Sn)、认知懒散型(Ci)和中断型四种思维风格维度上,国内罪犯表现为显著的高于美国罪犯。PICTS 量表中 Po 表征的是个体渴求权力和寻求控制的反应倾向,Sn 则表征罪犯试图以思维过程中给出好的评价或做出好的行为来消除其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认知倾向,Ci 量表评定的是走捷径或投机取巧的倾向,Ds 量表则是对犯罪行为过程中对目标的远见性的评价。因此,本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罪犯有较高的权力需求和控制欲望,在不能控制外部环境时,他们更倾向于努力或强制性的加强其权力并压制住别人(即产生犯罪行为),以获得并维持良好的自我体验;②我国罪犯更倾向于试图表达自己本质是“好”的或者以一些好的行为为例以否认他人对自己可能的坏的评价。这一现象与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密切相关。有研究者指出,中国人若在言行中表露出“恶”的一面,由于人性本善,他们必须说明自己的这个“恶”并非自己的本意,这样才能维持自尊和良好的社会适应<sup>[11]</sup>;③我国罪犯比美国罪犯更缺乏理智和周密的思考,通常表现出更为懒惰,及不负责任和不可靠的行为;④国内罪犯的注意更容易受到环境中其他事件的转移而使得自己的行为失去目标,或在行为中易受外界信息的干扰而缺乏对原计划的维持性,如表现出不断转换目标的不稳定行为。

综上所述,国内外罪犯由于所处文化背景的不同,从而在犯罪思维风格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别,国内罪犯更倾向接受道德规则,因此相对消极的看待犯罪原因和过程,其行为的越轨更多地源于非正常化的维持其权力和自尊;且其认知具有不稳定性 and 缺乏目标性。最后,由于美国罪犯的数据采样时间为 1995 年,因此研究结果的差异也可能受到不同时间

因素的影响,未来应进一步的开展类似的比较研究。

#### 参 考 文 献

- 1 Ronald B. 吴宗宪,等译.犯罪行为心理学.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170-171
- 2 Walters GD, White TW. The thinking criminal: A cognitive model of lifestyle criminality.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 Bulletin, 1989, 4(4):1-10
- 3 Walters GD, Geyer MD.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Psychological Inventory of Criminal Thinking Styles in relationship to the PAI, disciplinary adjustment, and program comple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2005, 84(3):252-260
- 4 Deirdre H, Ian O'Donnell. Criminal Thinking on Probation.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006, 33(6):782-802
- 5 Sykes G, Matza D. 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 A theory of delinqu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7, 22:664-673
- 6 王恩界,乐国安,严俊.心理学关于影响犯罪因素的研究进展.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5:40-44
- 7 朱海燕,宋志一,宋星.初入狱青年男性罪犯的人格特征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15(6):644-646
- 8 Walters GD. The Psychological Inventory of Criminal thinking Styles: Part I. Reliability and preliminary validity.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995, 22(3):307-325
- 9 Walters GD. Revised validity scales for the Psychological Inventory of Criminal Thinking Styles (PICTS). Journal of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2001, 32:1-13
- 10 Walters GD. The Psychological Inventory of Criminal Thinking Styles (PICTS): A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ssessment, 2002, 9(3):278-291
- 11 王登峰,崔红.人格结构的中西方差异与中国人的性格特点.心理科学进展,2007,15(2):196-202
- 12 Saulnier K, Perlman D. Inmates' attributions: Their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n coping.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981, 8:159-172
- 13 李玫瑾,屈明.反社会人格引发的严重暴力犯罪——对张君犯罪心理的剖析.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56-59
- 14 张小虎.犯罪行为的化解阻断模式论——兼谈违法成本对犯罪行为之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2,2:17-30
- 15 马皑.再论犯罪选择.刑事法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6. 12,37

(收稿日期:2008-04-30)